

农民学丛书

农民、政治与革命

——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

PEASANT,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Pressures toward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J. 米格代尔 著
李玉琪袁宁 译
姜开君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农民、政治与革命

——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

J. 米格代尔	著
李玉琪 袁宁	译
姜开君	校

中央编译出版社

(京)新登字 305 号

Joel S. Migdal

Peasant,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Pressures toward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74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农民、政治与革命:第三世界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压力/(美)米格代尔著(Migdal, J. S.)著;李玉琪,袁宁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1.

(农民学丛书/陈越光主编)

书名原文:Peasant,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Pressures toward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Third World

ISBN 7-80109-106-X

I. 农… II. ①米… ②李… ③袁… III. ①农民-关系-政治 ②农民-关系-革命 IV. D4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1196 号

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 邮政编码:100032)

丰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0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14 千字 印张:8.5625

印数 1001—3000 册 定价:12.9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缺页破损,请寄回更换)

《农民学丛书》编委会组成：

顾 问：杜润生 于光远

主 编：陈越光

执行主编：秦晖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孙立平 孙达人 刘志伟 李根蟠 陈支平 陈吉元
陈启能 陈越光 陆学艺 郭松义 姜义华 秦 晖
董凯忱 翟新华

外籍编委：

B. Galeski(波兰) 黄宗智(美国) 滨岛敦俊(日本)
T. Shanin(英国)

《农民学丛书》总序

已故的美国农民学家丹尼尔·托尼曾说：即使在当代发达工业化国家，“农民与农民的子孙”仍构成人口的多数。而在中国，他们可以说几乎构成了人口的全部。我们常以“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21%”为自豪，却很少提及它的另一方面——以世界上40%的农民“养活”世界上仅仅7%的“非农民”！连小学生都知道我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然而很少人注意到全球23亿农民中，我国农民占了9亿，即近2/5。当然，这个数据因中外“农民”定义的不同而并不准确。如果说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Farmer 或 Cultivator）中国人在其中所占比重可能低于此数据的话，那么对于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Peasant）而言，中国人在其中所占比重则无疑要高于此数据。在后一个意义上，说世界农民中的一半甚至更多都是炎黄子孙，也许并非夸张。

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尽管在改革时代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这并未改变我国农民人口在世界农民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局面。1981—1985年间，全球农村人口比重由55.3%降为48.1%，即下降7个百分点还多，而我国同期仅由80.2%降至

79.9%，仅下降了0.3个百分点！倘若这个趋势不改变，那么世界农民中大半为中国人的时代如果说尚未到来，也是为期不远，而中国人大半为农民的时代如果说将会过去，也是遥遥无期。据此而论的话，说农民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就是农民问题，该不算十分片面吧！

因此，中国的农民研究应该独步于全球，这应该视为生存问题而不仅仅是个荣誉问题。而这这就要求中国的农民研究必须走向世界。

在国外，“农民学”（Peasantology）一词作为术语产生于60年代；而作为一门学问，国外一般将其归源于本世纪初俄国民粹派学者A. B. 恰亚诺夫倡导的“社会农学”。在60—70年代之交，国际上出现了所谓的“农民学辉煌的十年”。有人甚至说这一时期农民研究领域取得的划时代进展可与物理学领域中牛顿定律的发现相比拟（T. Shanin, *Peasant and Peasant's Society*, Oxford, 1987）。不管此说是否夸大，农民研究自那时以来取得的进展是无庸置疑的。这种进展有其深刻的背景：

第一，战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大批不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农业国）获得独立，使“发展问题”日益突出。“不发达社会学”应运而生。而“不发达社会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农民学的一种研究方式。

第二，大萧条、法西斯暴行与世界大战所展示的“现代病”促使人们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后现代思潮在战后西方日益高涨。而苏共二十大以后人们又看到了另一种“工业化文明”——传统社会主义也有严重弊病。企图在两种“工业文明”之外寻找“第三条道路”的人日益增多。人们又想起了民粹派的呼声：“都市文明时代已过去了！”如果说“现代化”开始于对被中世纪农民文化所否定的古典城邦文化的重新发掘（文艺复兴），那么“后现代化”则唤起了对乡村的重新关注与“农民文化复兴”。尤其是近年来日

益活跃的“绿色运动”更在抨击“过分工业化”的同时明确把“支持农民与农村社区所选择的结构模式”作为己任(FPH: Program 1992—1995, Paris, 1992)。后现代主义—新民粹主义与“绿色思潮”相呼应,成为推动西方农民研究的强大动力。

第三,本世纪以来对历史与现实中的农民问题的经验性积累,也呼唤着新一层次的理论概括;农民史、乡村社会学、民俗学、农业经济学等与农民相关的学科的发展,需要更高层次的综合。过去历史学家认为古典城邦以工商立国,是奴隶制的天下,而中世纪则是庄园的世界,而现在人们发现古典城邦更大程度上是小农而不是工商业者和奴隶的集合;中世纪“庄园化”的程度也远非原先认为的那样大,因此,有必要重新估价“小农”在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现代化大生产”将消灭小农的假设未被证实。不仅东方诸国“一大二公”的农业改造基本失败,西方诸国的工厂式大农场也未能战胜家庭经营的小农场,而南方诸国还出现了殖民时代的种植园在新的基础上走向小农化的趋势。显然,“小农”未来的前途也远没有人们曾经设想的那么灰暗。总之,无论认识农民还是改造农民,都需要有新思维。

这些背景今天仍在发展,它决定了农民学今后仍将是国际上方兴未艾的前沿学科。今天,农民学作为对农民群体的全方位研究,正日益以其巨大的理论魅力与实践精神,“把众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农学家团结在一种共同的兴趣之中”,并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各种理论体系,其成果又反过来有力地推动了上述诸学科的发展。这对我们不乏有益的启示。

国人对农民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新中国诞生于一场新式的农民革命中,它本身就凝聚着那一代有志者认识农民、改造农民的努力。共产党人与国统区左翼知识界(如“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诸前辈等)都对此卓有贡献。而当时的地政学院及农村复兴

委员会系统诸学者、“乡村建设派”人士、满铁庶务部研究人员与来华西方专家如卜凯等，也各有造诣，自成学派。建国后，“农民战争史”曾红极史坛，党政部门的对策性农村调研从未中断，改革中的农村更是举国、举世关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农民研究被分割为农经、农史、史学以及政策研究等互相脱节的诸部门，而且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大，与国际学界相隔绝，研究水平远不能令人满意。应当说，农民学在我国还处于开创期。

当然，我国农民研究的背景与国外有很大区别。别的且不论，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推进现代化，而不是“反思现代化”，仅此一点就会带来价值尺度的根本差异。如果说过去的中国思想界曾经深受“现代主义的欧洲中心论”影响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同样受到“后现代化主义的欧洲中心论”影响。“影响”即交流，交流决非坏事。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西方农民学某些流派的“乡村理想主义”（rural idealism）与“乡土中国的传统思潮”具有完全不同的土壤，轻易地互认“知音”未必可取。

另一方面，在经验层次上，中国农民与外国尤其是西方农民的差异犹如国内各时各地各层农民之差异或西方各国间农民之差异一样不可忽视。当然既同为“农民”，他们又必然有共性，因而别人的研究才能为我们所借鉴。但他山之石可攻玉，却不能代玉，中国必须有自己的农民学流派，这套丛书就是为这个目的出版的。

本丛书兼收理论研究、经验研究与工具书类著作，其意不仅在于以有限的选题，尽可能容纳多维度的探索，而且在于农民学学风的建设。当今学界，有人力戒空疏之弊而大倡微观分析，有人深恶短钉之学而力主宏观概括。其实乡土中国两千年来的传统学术一直是“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轮流称大，其流弊不在于它太微观还是太宏观，而在于它缺乏形式化的科学思维，因而难以在宏观—微观—宏观或抽象—具体—抽象的认识循环中建立实证（或证伪）机制以推动学科的发展。我们希望中国的农民学

能走出那种“汉学—宋学循环”的陈套，实现理论与经验两种研究的现代认识循环。

本丛书译、著并重，并将逐步增加“著”的比重。第一批收入本丛书的几本译作都是有代表性的国外农民学名著，作为一家之言产生过很大影响。几本国人的专著反映了作者在农民学领域的可贵探索，是非长短正待后人评说。前者为攻玉之石，后者为引玉之砖，或攻或引，总为去瑕存瑜，渐图完璧；一砖一石，但求负重为基，奠我华宇。我们希望它们都能有助于构筑我国的农民学研究大厦，为我们这个农民国度的现代化事业略尽绵薄。

本丛书由中国农村发展信托投资公司组织并资助出版，并邀请国内外农民研究各学科的专家学者组成编委会，负责学术审定与编辑工作。在改革之潮中崛起的中农信公司以“中国农村发展”为己任，也以中国农民学研究的开拓为己任。她坚信神农之光永照华夏，中国农民的未来、中国农民学研究的未来与中农信的将来，都将充满光明！

中 译 本 序

60年代后期西方的农民学研究进入所谓“辉煌的十年”后，关于“农民革命”的论著开始多了起来。尤其是70年代中期受美国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惨败的影响，“农民革命”的研究一时达于高峰，诚如本书所云，那几年“关于农民革命的社会科学著作多如牛毛”。然而这林林总总的著作大多存在着两个“老套”：其一是过分“实用”的幕僚之学，即“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在政府的指导下，最终得出了一大堆如果不是有害的，至少也是无用的反暴乱的策略性方法”。其二是走文化人类学的路子，过分强调特殊的“民族性格”、“传统之根”和“文化移植”的作用，以致钻入文化决定论的牛角尖。仿佛某些民族天生就有好动喜乱的性格，仿佛一场血流漂杵的冲突不是基于实际利益，而只是为了捍卫或反对某种形而上的“传统价值”、拒斥或欢迎某种“文化基因”的植入似的。当然，也有许多作者突破了这些“老套”的窠臼，提出了富有创意的理论模式。其中沃尔夫的《20世纪农民战争》、沙宁的《尴尬的阶级：发展中社会的农民政治社会学》、莫尔的《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和本书，是影响较大的几种。

本书作者约尔·米格代尔是美籍犹太裔政治学家，曾在哈佛师从那位近年来先后以“新权威主义”和“文明冲突论”两度在我国引起轰动的塞缪尔·亨廷顿先生，是亨廷顿学派中以研究农民政治学见长的一员健将。他于1972年在哈佛发表博士论文《缩小的世界中的农民》，两年后在此基础上扩充而成本书，并以此一举成名。此后他先后任教于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1974—1975年）、哈佛大学（70年代后期）、华盛顿大学（1980年起）、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1985年起）、普林斯顿大学（80年代末）等学府，主要著述有《都市化与政治变迁》（1977）、《巴勒斯坦的社会与政治》（1980）、《探索中的发展政治学及其演变》（1983）和《强社会、弱国家：第三世界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与国家能力》（1988）等等。^①

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后起之秀，米格代尔在农民政治行为与政治思维的研究中都体现了这一学派的特点。他开篇就对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文化决定论倾向（“文化移植”理论及人类学方法的滥用）提出批评，这与亨廷顿等人当时的姿态是一致的。有趣的是，今天把“文明冲突”夸张得耸人听闻的亨廷顿，当年却完全把现代化看作超文化的行为理论化过程。他经常提到欧美与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某种区别“与其说是基于文化上的差异，毋宁说是反映了它们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达的不同程度”^②。米格代尔同样从超文化的行为选择理论入手来分析农民政治，并因此着眼于“在所有农村中都存在的具有共同特点的生活模式”。他强调要注意“当地制度（而不是‘文化’）对个人选择所发生的根本性影响”，并从结构—行为选择的角度把传统农村分为地主控制的农村与“控制松散的农村”（freeholding）两种类型，分析了他们各自的“内向型力量”（保守力量）与“外向型力量”（现代化力量）的冲突模式。在他看来，这些“力量”都基因于“结构”内在的利益背景，具有内在的行为逻辑。“经济危机”导致趋向“外

向型”的变革，而变革的具体形式则与农民和外界力量之间利益与服务方面的“社会交换”的具体模式有关。在此框架下，他对农民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生活的诸层面都作了详尽的类型学分析，而这些类型的划分不是以文化基因的遗传与植入、而是以行为过程本身的因果关系为基础的。

在方法论上，米格代尔的研究同样具有这一学派的风格，如强调价值中立，重视量化分析，反对抽象假设而主张只研究可观察到的现象等等，而在反对唯个案分析、注重宏观层次上的经验归纳与理论建构等方面，他的研究也具有向后行为主义过渡的特征。从价值中立的基点出发，米格代尔批评了这一领域许多研究的幕僚化倾向，并对一些西方研究者为表示与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而回避经济利益分析的作法表示不满（米格代尔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从本书中不难发现，他的许多分析从方法到结论都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有契合之处）。而他对经验样本量化分析的重视，则可从他对农民社区“外向程度”的别出心裁的数值化测定（见本书附录一）略见一斑。

无疑，这本著作在许多方面可以给我们以借鉴与启迪。80年代“文化热”中存在的文化决定论倾向在我国的农民学研究中是有影响的，它虽对过去的普世进化论解释模式的简单化弊病起到了矫枉作用，但却有过正之虞，既易使人忽视行为选择的意义，又可能导致文化宿命主义与另一种形式的机械决定论。对此，听听不同于“文化解释”的另一种解释模式或许不无裨益。其次，米格代尔把传统农村分为地主支配的农村与“控制松散的农村”这两种同质异类结构的理论也很能给人以启发。我国学界过去习惯于只从地主—农民对立的两极模式来看待传统农村（另一方面，反对这一模式的非主流观点，如“乡村建设派”所论，又有把传统农村过于理想化而忽视其非理性的一面之弊），然而事实上，以国家—“自耕农”为主要格局的非理性结构，即米格代尔所说的那

种“控制（指私人地主之控制而言）松散”类型，在我国历史上的传统农村中意义着实不小。^③米格代尔对这种类型的论述因此在我看来是颇有意思的。最后，米格代尔对51个农民社区样本外向程度的数值测定结果也十分耐人寻味。根据这个结果，中国的7个样本平均“对外联系程度”高达7.43，远远超过了51个样本的总平均值，而且7个样本均被定为“外向型社区”。这不仅与我们过去的传统理论，而且与我们通常的感性体验都冲突甚大。人们有理由怀疑他的测定，而且事实上这一测定也与他在这本书中的许多论述构成了矛盾，但无论如何，它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必须解释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过去是被忽略了的。

另外，米格代尔这部书相对而言篇幅不算大而信息浓度却甚高，他在书中不仅归纳整理了五六十个田野样本的经验资料；而且对农民政治行为与政治思维研究中大大小小的问题都详列了诸家（主要限于西方）之言并一一作出评论，其信息浓缩的功能不小。70年代中期以前，即西方农民政治社会学学科化的关键时期的研究状况，通过此书大致可见轮廓。仅此一点，它就很值得一读。

无疑，本书也有许多缺陷，有许多未必成立的一家之言。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姑且不说，仅从实证角度而言，米格代尔自己的田野调查和经验根据主要来自印度、中东和拉丁美洲，他在论述传统农村政治时也主要以上述经验范围为基础。然而在谈到作为全书点睛之处的“农民革命”问题时，显然由于上述经验范围内并无此种革命之典型，使他不得不转而以中国、越南的经验为据，而他对这两国的了解显然是不够的，于是在一系列论述上便不免给人以隔靴搔痒之感，反不如他对传统农村政治的分析俨然成理。此外，他与其师亨廷顿一样，热心于在广泛归纳的基础上构造理论体系，因而在旁征博引之中不免有牵强附会之论，在新见迭出之际不免有生造名词之嫌。这些，相信读者自能体察。

秦晖

1994年12月于京西万寿寺

注 释：

- ① 关于米格代尔的治学经历，可参见其所著《强社会、弱国家：第三世界中的国家—社会关系与国家能力》（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8年）的序。
- ② 塞缪尔·亨廷顿：《转变中社会的政治秩序》，江炳伦、张世贤、陈鸿瑜合译，台北黎明公司1981年版，第51页。
- ③ 参见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73—84页。

作者自序

在《农民、政治与革命》英文版出版 20 年之后，该书中文版终于面世了。70 年代，本书与其它几部著作一起向长期统治西方国家的学术传统提出了挑战。这种传统从上层角度解释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形式和性质。农民即使被关注到，也都是受制于权力和政策，而绝不是社会变革的动因。由于中国革命和越南战争的巨大影响，我决心表明农民社会在 20 世纪的伟大变革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

20 年后的今天，这本书能在中国翻译出版，我感到无比的高兴。这些年中，关于国家和社会的研究文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从印度社会科学对底层阶层的研究到法国的米契尔·福考尔特 (Michel Foucault) 和后结构主义者的研究，都表明在解释权力结构和社会变革的本质时，对农民这样的社会群体的地位有了新的理解。

那些本书所批评的旧学术传统的核心是什么呢？旧的理论强调高层政治，认为首都上层人士的言论和行为是理解权力形成的关键。美国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的重点在于国家中心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以及分享这种价值观并处在这类制度的关键位置上的政

治、宗教和经济上层人士。在人们精雕细琢地描述和分析这些中心时，中心以外地区被降到了次要的地位。这种从属地位的主要特征是只能接受来自中心的命令、政策和价值观念。

尽管这些旧的研究还没被放弃，但却不得不向那些对自己某些基本假设提出质疑的学术研究做出让步。《农民、政治与革命》以及诸如此类的著作指出了国家中心如何易受其外围地区的影响。争夺社会控制权的斗争不只存在于国家的发号施令的上层或精英集团内，这种斗争的结果很可能是由那些远离中心城市辉煌灯火与豪华轿车的事件所决定的。换句话说，正如社会中心能决定国家的影响范围和能力一样，社会边远角落发生的斗争和事件同样决定着国家的影响力和能量。

最近几年，对农民的研究正是在这一条件下勃发出新的生机。如果《农民、政治与革命》在任一方面经受了时间的考验，那么，正是由于它坚持指出农民社会并不只是简单被动地接受在世界范围内对其造成严重冲击的全球经济变革和国家政策，这些过程被农民社会因地制宜地改变和重构。更令人惊奇的是，农民的行动已经改变了这些导致经济变革和产生国家政策的制度，即市场与国家。要想理解国家中心，你必须首先研究偏远的农村。

约尔·米格代尔

华盛顿州西雅图

1995年4月4日

致 谢

由于给本书提供帮助的人太多，加之对于某些我所引用的观点的出处还不很清楚，所以，在我指名致谢的范围中，肯定有所遗漏。尽管我已经在本书注释中注明了我所引用的观点的出处，但我觉得有必要对下面这些人专门道谢。

塞缪尔·亨廷顿教授为我这项工作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给予了持久的支持和有益的指教。塞缪尔·波普金对我的研究做了深刻透彻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正是他的忠告才激起我对农民境况的兴趣。我还充分采纳了罗伯特·罗兹所提出的一系列有价值的见解。

我要特别感谢那些阅读了本书各章节的初稿并提出中肯意见的人，他们是：约翰·邓肯·鲍威尔、弗朗西丝·希尔、杰弗里·雷斯、乔治·多明久斯、史密森·泽尔尼克、埃弗里特·哈根、佩尼娜·格雷泽、迈伦·格雷泽、芭芭拉·克莱格。

福特基金会驻印度新德里的工作人员给我提供过令人愉快的帮助，使我在印度北方邦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收获。农业部的约翰逊博士和纳思·辛格先生也给我重要的帮助，就此一并致谢。

我格外感谢我的妻子玛茜，她充当了我主要的批评家、译员、调查旅行的伴侣和采访农村妇女时的访员，还承担了编辑工作。

最后，我将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正是他们将我引上追求知识和智慧的道路。

约尔·米格代尔